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徐文武.清华简《楚居》“湫郢”考[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6(3):54-59.

清华简《楚居》“湫郢”考

徐文武

(长江大学 人文与新媒体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0)

摘要:因“湫”与“狄”二字形近,《水经注·沔水》将“湫城”讹写为“狄城”。《水经注·沔水》所记“湫城”与清华简《楚居》中的“湫郢”为同一楚地。根据《水经注·沔水》对“湫城”地理位置和周边水系的记载,可以将“湫城”定位在今湖北省钟祥市长寿镇长寿古城遗址,这里也就是《楚居》中的“湫郢”所在地。春秋战国时期,湫郢先后成为楚国军事重镇、贵族封邑和楚王避居的行都。

关键词:湫郢;湫城;长寿城址

分类号:K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3)03-0054-06

对清华简《楚居》所载诸“郢”地望的探索和对相关史实的研究,是破解至今仍然困扰我们的众多楚史之谜的重要途径。本文以清华简《楚居》所记“湫郢”为例,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对湫郢的地望进行探讨,并对涉及湫郢的相关史实进行探究。

一、《楚居》“湫郢”及其地望诸说

在清华简《楚居》所记诸“郢”中有“湫郢”。赵平安在《试释〈楚居〉中的一组地名》一文中认为,“湫”和“湫”字因字形相近,很可能是在转写过程中写作“湫”。^[1]学者们普遍接受这一观点,将“湫郢”隶定为“湫郢”。《楚居》所载“湫郢”在春秋战国时期先后五度成为楚王的居止之地。春秋时期,楚文王从“疆郢”徙居“湫郢”,楚成王从“郢郢”徙居“湫郢”;楚惠王因白公之乱从“为郢”徙居“湫郢”,并将“湫郢”更名为“肥遗”;战国前期,楚简王(《楚居》写作“柬大王”)为太子时,一度居于“湫郢”;楚悼王因“中射起祸”而徙居“肥遗”,此“肥遗”也即“湫郢”。

在《楚居中》,“湫郢”始见于楚文王在位时。楚文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 689 年至公元前 672 年,此时为春秋前期。“湫郢”在《楚居》中最后一次出现,

是在“湫郢”被更名为“肥遗”后,以“肥遗”之名出现在“中谢起祸”事件之后。河南新蔡葛陵楚简也记载有“肥遗”这一地名,称之为“肥遗郢”;“王自肥遗郢徙于郢郢之岁”(甲三:240),这一记载正好与《楚居》所记“肥遗”相互印证。李学勤先生根据葛陵楚简的记载,推定“王自肥遗郢徙于郢郢之岁”当在公元前 377 年,即楚肃王四年^[2],此时当属战国中期。以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来看,“湫郢”在春秋早期至战国中期长达 300 年左右的时间里,一直是楚王的一处重要的居止之地,可见其在楚国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李学勤将《楚居》所载“湫郢”与《左传》中记载的一处名“湫”的楚地名联系起来,认为二者有一定的关联性。^[3]《左传·庄公十九年》记:“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遂伐黄,败黄师于踰陵。还,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楚文王出师大败黄国后,在返回途中,在一处名为“湫”的地方身染重疾,不久病故。在《楚居》中,楚文王是最早居“湫郢”的楚王。《左传》所记楚文王所“还”之“湫”,应当就是《楚居》所记“湫郢”。

关于“湫郢”的地望,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发

收稿日期:2023-02-10

基金项目: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长江大学荆楚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楚简与楚国城市研究”(CWH202009)

作者简介:徐文武(1964—),男,湖北洪湖人,教授,主要从事楚文化研究。

表了不同的观点。其一，认为“湫郢”即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赵平安说：“颇疑楚皇城就是湫的遗迹。”^[1]其后，牛鹏涛在《清华简〈楚居〉武王、文王徙郢考》一文中也赞同其说，以为今襄阳宜城东南的楚皇城即为“湫郢”。^[4]其二，认为“湫郢”在湖北宜城小胡岗遗址。小胡岗遗址位于宜城市郑集镇红星村，南北长约 1500 米，东西宽约 1200 米，是一处东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在该遗址南约 1 公里的蒋湾牛山曾发现一处春秋中期的墓地，极有可能与小胡岗遗址有关联。笮浩波据此认为：“小胡岗遗址的年代与成王时期相合，这也反证了小胡岗遗址可能为‘湫郢’。”^[5]其三，认为“湫郢”在河南泌阳象河关。黄灵庚在《清华战国楚简〈楚居〉笺疏》一文中提出，湫郢即《鄂君启节·车节》所记“象禾”^[6]，又据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以为“湫郢”“即今河南泌阳县北象河关”，“车行出方城伏牛山隘口，折东南抵此”。^[7]至于“湫郢”与“象禾”是如何关联的，黄先生在文章中未有涉及。以上关于“湫郢”地望的诸种说法，证据并不充足，难以令人信服。

二、从《水经注》入手探讨“湫郢”地望

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楚国以“湫”为地名的，除了有“湫郢”外，还有“湫城”“湫邑”。这些以“湫”为名的地方，应该指的是同一个地方，属于历史地理学上常见的“同地异名”现象。在“湫”字后分别加上“郢”“城”“邑”，只是为了说明“湫”地所具有的不同功用。因该地曾作为楚王的居止之地，则有“湫郢”之称；因该地建有城垣之类的军事设施，则有“湫城”之谓；因该地曾被楚王封赐给贵族作为采邑，则有“湫邑”之名。我们可从“湫城”“湫邑”入手寻找线索，探讨“湫郢”的地望。

“湫城”之地名，最早见于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左传·庄公十九年》记楚文王伐黄返楚“及湫”，杜预为“湫”作注谓：“南郡都县东南有湫城。”由此可见，杜预认定《左传》所记“湫”即“湫城”。古本《水经注》中也载有“湫城”，不过，在传世诸本中，均将“湫城”讹写作了“狄城”。清武英殿聚珍本《水经注》卷二十八“沔水”记，沔水（汉水）过宜城县城后，东南流，东岸有都县故城、狄城：

沔水又东，敖水注之。水出新市县东北，又西南迳太阳山，西南流迳新市县北；又西南而右合枝水。水出大洪山而西南流，迳襄阳都县界，西南迳狄城东南，左注敖水。敖水又西南流注

于沔，实曰敖口。

在这段文字中出现的“狄城”本为“湫城”，对此，杨守敬、熊会贞在《水经注疏》“清写本”（北平科学社影印）和“最后修订本”（台北中华书局影印，也称“定稿本”）中早有订正。《水经注疏》最后修订本曰：

朱“湫”讹作“狄”，赵、戴同。会贞按：明抄本、黄本作“秋”。考《左传》庄十九年，楚子伐黄，还及湫有疾。杜注：南郡都县东南有湫城。续汉志注引左传及杜注同。准以地望，即此注所指之城，则此当作“湫”无疑，“秋”乃湫之脱烂，“狄”又形近致讹耳，今订。在今钟祥县北。^{[8]（P162）}

熊会贞认为，《水经注》诸种版本将“湫城”讹为“狄城”，乃因“形近致讹”，当据《左传·庄公十九年》予以订正。

《水经注·沔水》对“湫城”（讹作“狄城”）所在地的水系有较为清晰的记载，这是迄今所见研究“湫城”地望最有价值的资料。据上引《水经注·沔水》的记载，枝水“西南迳狄（当作“湫”）城东南”后注入敖水，这说明两点：其一，湫城位于枝水与敖水会合之前的河段；其二，枝水流经湫城东南，流向为西南方向。根据《水经注·沔水》的文字描述，我们可以绘出“湫城”与汉水、枝水、敖水位置关系示意图，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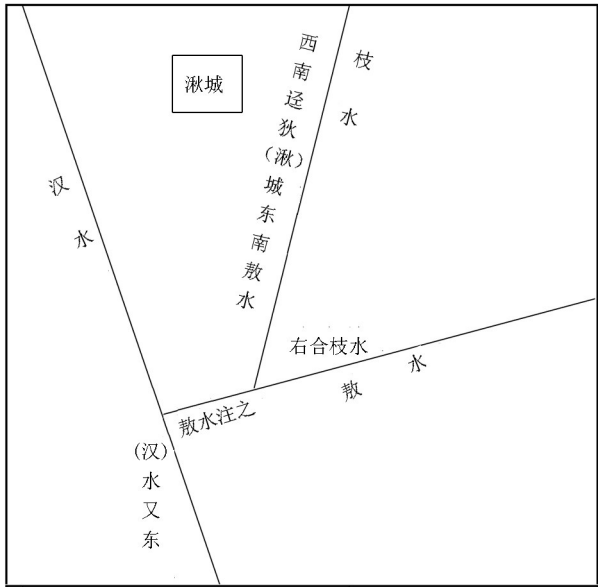


图 1 据《水经注·沔水》绘制的“湫城”与汉水、枝水、敖水位置复原示意图

根据《水经注》所绘出的汉水、枝水、敖水位置关系示意图，可以在今湖北省钟祥市境内找到相应的水系。钟祥市境内有汉水及其支流敖水、枝水，无论

是河流名称,还是河流走向,以及干流与支流的分合关系,都与《水经注》所记完全一致,堪称完美“复盘”。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七十七“湖广三”之“承天府”载:

直河在府北十五里,其水直入汉江,故名。俗讹为“池河”。府北三十里又有瓦埠河,流入直河。《志》云:池河,即《水经》所载枝水也。源出大洪山,西南流经襄阳宜城县界。又有澍水,在府北六十里,合流而西南注于沔水。

承天府,明嘉靖十年(1531)升安陆州改置,治钟祥县(即今湖北钟祥市),属湖广布政使司;清顺治三年(1646)改为安陆府。在今湖北钟祥市北有直河。直河,古称“枝水”,又称“长寿河”,发源于大洪山。《大清一统志》卷 265“安陆府”“山川”记:“枝水,在钟祥县北”。今“直河”因《水经注》所记“枝水”而得名。清同治《钟祥县志》卷三“直河”条记:直河“直入于汉,俗讹为池河”。又记:“直河即所谓枝水也。”直河有一条与枝水同发源于大洪山的支流,名曰“敖水”,又称“澍水”,也称“敖河”。《大清一统志》卷 265“安陆府”“山川”记:“敖水,在钟祥县北,今名直河。”

今钟祥市境内的直河水系与《水经注·沔水》所记枝水、敖水,无论是河流名称,还是河流方位、水源及流向,都是完全吻合的。古今学者对此无异议。对此,荆楚历史地理学名家石泉在《古代荆楚地理新探》一书中说:“在(钟祥——引者注)县城附近稍北,西南入汉水的较大河流敖水(又称直河)及其支流枝水(又称长寿河),则与《水经注·沔水篇》所记敖水及枝水基本相符。古今于此皆无分歧。”^{[9](P124)}

在确定了枝水与敖水的地理位置后,接下来探寻“湫城”的位置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了。结合《水经注·沔水》所记,枝水“西南迳狄(湫)城东南”,大致可以确定古湫城的地理位置应在今钟祥市长寿镇一带。张修桂在《〈水经注·沔水〉襄樊——武汉河段校注与复原(上篇)》一文中,根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湫城”定位“在今钟祥长寿店附近”^{[10](P81)},这一结论是可信的。

在古代文献的记载中,关于“湫城”的定位,多是以钟祥、宜城作为参照点进行描述的。如《大清一统志》卷 265 记载:“湫城,在钟祥县北。”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襄阳府”条下云:宜城县“东南有湫城,为楚浞邑”^{[11](P68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云:“湫音剿。《清一统志》谓湫在湖北省钟祥县北,《春秋大事表》谓在湖北省宜城县东南,其实一也。”今长寿镇正位

于钟祥市以北、宜城市东南方向,这与古代文献中对湫城的定位也是完全吻合的,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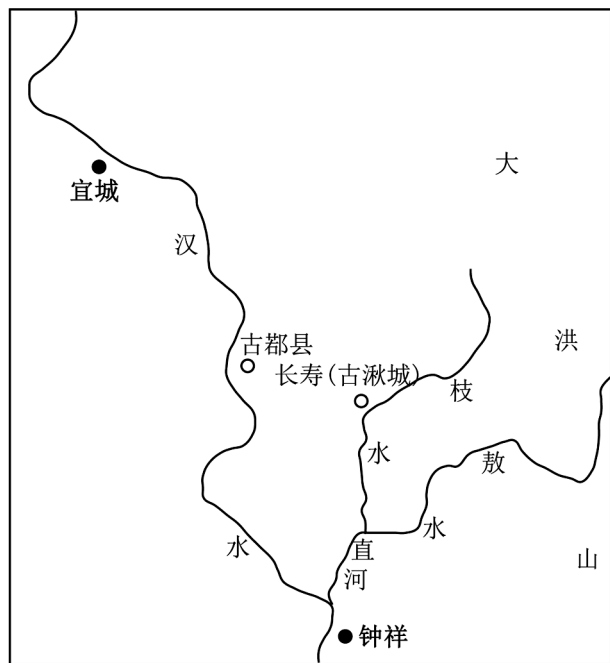


图 2 直河水系及古湫城地理位置示意图

在今钟祥市长寿镇及其周边发现的东周时期古城址和古遗址,极有可能与湫城有关。在钟祥市长寿镇有一处古城遗址,国家文物局编写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词典》称该城址为“长寿城址”,并认定该城址为“东周时期旧城”。^{[12](P390)} 长寿城址位于长寿镇西北约 500 米处,呈不规则长方形,长 700 米,宽 500 米,城垣厚约 6 米,城门 4 个,环城河宽约 4 米,发现水井多处。现存土城长 35 米,宽 10 米,高 1.5 米。结合古湫城的地理位置来看,长寿城址应该就是东周时期的湫城城址,也就是清华简《楚居》所记的“湫郢”遗址。

在长寿镇南约 4 公里的刘畈村,曾发现东周时期的陶家巷遗址。陶家巷遗址略呈方形,面积不大,南北长 170 米,东西宽 150 米,面积 2.55 万平方米,高出平地 80 厘米。文化堆积层厚约 1.8~2 米之间,内含有陶器、石器等,陶器有鬲、罐、盆、瓮等残片,纹饰有绳纹、附加堆纹等,其器形特征、纹饰与东周时代的器形特征、纹饰相近似。^{[13](P775~776)} 陶家巷遗址距离长寿城址不远,这里应是与湫城相关联的一处东周时期楚人的建筑台基遗址。

何光岳在其所著《中华姓氏源流史》一书“湫氏”条下,将湫城定在“今流水乡周家坡”。^{[14](P510)}“流水乡”今为湖北省襄阳市宜城市流水镇。流水镇位于

宜城东南部,汉水东岸。周家坡位于流水镇以东约5公里处。此地不在直河水系范围内,与枝水、敖水相去甚远,与《水经注》所记“湫城”的历史地理环境不符。何光岳将周家坡与“湫城”联系起来,不知何据,不足信矣。

三、与“湫郢”有关的史实发微

湫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功用。春秋早期,湫郢是楚国北进中原的军事重镇;春秋中后期,湫郢是楚国贵族的封邑;战国中前期,湫郢成为楚王避居的行都。

春秋早期,湫郢是楚文王北拓中原的重要军事重镇。楚文王继位后,继承楚武王的事业,全力向北开拓。他继位的第二年,加快了北进中原的步伐,先后伐灭邓、申、吕等小国,使楚国的势力进入南阳盆地,打开了通向中原的门户。《左传·哀公十七年》记,楚文王“实县申、息,朝陈、蔡,封畛于汝”。楚文王一路挥师北上,灭申国、息国以为楚县,使陈国、蔡国俯首称臣,楚国的边境到达了淮河支系汝水流域。

清华简《系年》记载了楚文王向淮河干流及其支流汝、颍扩张的史实。《系年》第5章记:“文王以北启出方城,圾肆(封畛)于汝,改旅于陈。焉取顿以恐陈侯。”“顿”即顿国,是周朝在淮水中上游地区分封的“汉阳诸姬”之一。顿国都城城址位于今河南周口市商水县平店乡李岗村西,称为“北顿”。楚文王灭顿后,楚成王时又复顿。楚国恢复顿国时,在今项城市南顿镇东北为顿国新建了都城,称为“南顿”。《系年》记楚文王“取顿”之“顿”系“北顿”。楚文王攻灭顿国,说明此时楚国的势力已经到达淮河支系颍水流域。为配合楚国势力不断北拓,楚文王不断将军事重心向北迁移。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楚居》所记载的楚文王迁郢路线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楚居》记:“至文王自疆郢徙居湫郢,湫郢徙居樊郢,樊郢徙居为郢,为郢徙居免郢,焉改名之曰福丘。”疆郢,即《左传·桓公十一年》所说的“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之“郊郢”。^{[15](P265)} 郊郢,史家均以为在钟祥郢州故城,即今湖北省钟祥市郢中镇,如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77“安陆府”即谓府治钟祥在“春秋时为楚之郊郢”,又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云:“郊郢,当即今湖北省钟祥县郢州故城。”湫郢位于今钟祥长寿镇,在疆郢之北,南距疆郢30公里。樊郢,《楚居》整

理者据《水经注·沔水》认为“在今湖北襄樊市樊城”。^{[16](P188)} 樊郢位于湫郢以北100多公里。由此可见,楚文王先居疆郢(今钟祥市郢中镇),后改迁湫郢(今钟祥市长寿镇),再北迁樊郢(今襄阳市樊城区),将楚国的军事重心向北推进了130多公里。楚文王一路向北,正是为了配合实施北拓中原的战略。

春秋中后期,湫郢成为楚国显贵宗族伍氏封邑。南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十姥》云:“伍氏出自春秋时楚庄王嬖人伍参,以贤智升为大夫,生举,食邑于椒,谓之椒举。其子曰椒鸣、伍奢。椒鸣得父邑,而奢以连尹为太子建太傅。”^①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亦云:“伍氏以其祖伍参食邑于椒,故其后为椒氏。”^{[17](P134)} 伍氏出自半姓,与楚王族同姓,自伍参始,伍氏四代相传为楚大夫。伍参辅佐楚庄王有功,受封于椒邑,其后以封邑为氏,为“椒氏”。伍参之子伍举,又称为“椒举”,如《国语·楚语上》曰:“椒举娶于申公子牟。”韦昭注曰:“椒举,楚大夫,伍参之子、伍奢之父伍举也。”因“椒”与“湫”二字古通,椒氏之“椒”又写作“湫”。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曰:“声子使椒鸣逆之”,“椒鸣”在《国语·楚语》中写作“湫鸣”。有学者据此认为,伍参的封地椒邑,正是《左传》所记楚文王病卒之地“湫”^{[18](P211)},不为无据。

春秋早期之“湫郢”,在春秋中期成为伍氏封地“湫邑”。湫邑作为伍氏家族的食邑,经伍参、椒举(即伍举)、椒鸣三代世袭后,至楚昭王时被收回,再度成为楚王的“湫郢”。楚平王时,伍举之子伍奢因遭费无极陷害被杀。公元前506年,伍奢之子伍子胥为报杀父之仇,引吴师入郢,占领楚郢都长达10个月之久。受这一事件的影响,伍氏家族在湫邑的封地理应被楚王收回。吴师入郢之后,伍氏宗族再无显贵之人,即可说明这一问题。

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湫郢又成为楚王避居的别都。周代天子、诸侯在国都之外另建有别都。《史记·楚世家》云:“于是王(指楚灵王)乘舟将欲入鄢。”集解引服虔曰:“鄢,楚别都也。”又,《国语·楚语上》云“灵王城陈、蔡、不羹”,韦昭注:“三国,楚别都也。”可见,春秋时期,楚国不仅有别都之制,而且还有多处别都。别都有多种类型,有的是离宫型别都,有的是行都型别都。^{[19](P36)} 离宫型别都在国都之外修建有城池、宫殿、园林,作为君王游猎、享乐之所;行都型别都是君王的临时驻地,或者是国都发生

① 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二十四,钦定四库全书版。

祸乱时君王的避居之地。战国时期,湫郢是楚王躲避祸乱的移居之地,属于“行都型别都”。据《楚居》记载,战国时期楚惠王和楚悼王都曾因宫廷内乱而避居湫郢。

楚惠王避居湫郢,乃因“白公起祸”。《楚居》记载:“白公起祸,焉徙袞湫郢,改为之焉曰‘肥遗’。”“白公起祸”是楚国发生的宫廷内乱事件,后世也称为“白公之乱”。公元前479年,楚平王之孙白公胜借向楚惠王敬献战利品之名,乘机发动叛乱,带兵攻入郢都,劫持楚惠王。白公胜后被前来勤王的叶公子高攻败,楚惠王获救。可能是因为在此次事件中受到惊吓,再加之楚郢都有内患需要时间清除,楚惠王前往湫郢,以湫郢作为临时避居之地。

楚惠王避居湫郢期间,将湫郢改名为“肥遗”。“肥遗”作为地名也出现在河南葛陵新蔡出土楚简中,写作“肥遗郢”:“王自肥遗郢徙于郢郢之岁。”楚惠王为何要将“湫郢”改名为“肥遗”,文献中并无相关记载,但也并非无迹可寻。“肥遗”见于《山海经·西山经》:“(英山)有鸟焉,其状如鹑,黄身而赤喙,其名曰肥遗,食之已疴,可以杀虫。”有学者认为,这种“状如鹑”“黄身”“赤喙”的鸟并非是一种神秘的鸟类,其实就是在长江中游和长江以南地区常见的一种名叫“竹鸡”的鸟。^{[20](P269)}竹鸡肉可入药,用于治疗多种疾病。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第四十八卷“禽部”记载,竹鸡肉主治“野鸡病、杀虫,煮炙食之”^{[21](P1395)}。又,明代吴禄辑《食品集》云:竹鸡“味甘平,无毒。主野鸡病,杀虫。煮炙食之”^{[22](P59)}。从先秦时期楚人所著《山海经》至明代中医著作都一致认为,煮炙竹鸡肉,食之可以“杀虫”。文献中关于竹鸡可以煮食用以杀虫的记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楚惠王曾因吞食水蛭(俗称“蚂蟥”)而致病的历史故事。汉代贾谊《新书·春秋》、刘向《新序·杂事》、王充《论衡·福虚》上都记载有楚惠王吞蛭的故事。《论衡·福虚》记云:“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是夕也,惠王之后而蛭出,及久患心腹之积皆愈。”他书所记大致一致,大意是说:楚惠王进餐时,在腌渍蔬菜中发现了一条水蛭。他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如果依法追究,负责君王饮食的庖厨和负责监食的人都要定罪受罚;如果不追究责任的话,又会损害国法的威严。楚惠王出于仁德之心,将这条水蛭吞下肚去,引发了腹疼。当晚,惠王出恭时,水蛭随之排出体外,腹疼好了,甚至久治不愈的腹疾也好了。惠王生吞水蛭引发腹疼后,在大臣的追问下,他说出了实情。在得知病因

后,宫廷御医一定会采取措施对症医治。虽然文献中并没有记载御医为惠王医治的过程,无从知晓御医给惠王吃了什么药,但以当时人们所具有的肥遗(竹鸡)“可以杀虫”的医学常识,可以推想御医的首选治疗方案应该是将煮熟了的肥遗(竹鸡)让楚惠王吃下,以达到“杀虫(水蛭)”的目的。楚惠王在病愈后,将“杀虫(水蛭)”的主因归之于肥遗(竹鸡),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据以上分析,楚惠王很可能是在生吞水蛭后,因食肥遗(竹鸡)而治好了腹疾,为纪念此事,他遂将“湫郢”改名为“肥遗”。

楚悼王在位时,也曾因“中谢起祸”而避居肥遗(湫郢)。《楚居》云:“至悼哲王犹居朋郢。中谢起祸,焉徙袞肥遗。”有学者将“中谢起祸”与楚悼王死后楚国旧贵族射杀吴起一事联系起来,这一说法是有问题的。从《楚居》的行文来看,“中谢起祸”后,“徙袞肥遗”的行为主体是悼哲王(即楚悼王)。楚国贵戚大臣因吴起变法而心生怨恨,射而杀之,这是发生在楚悼王死亡之后的事。《韩非子·和氏》云:“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吴起枝解于楚。”楚悼王既已死亡,就不可能“徙袞肥遗”了。因此,“中谢起祸”与吴起因变法被杀一事无关,应该是发生在楚悼王时期的另一起宫廷政变事件。这一事件并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

“中谢”,在传世文献中也写作“中射”,是楚国宫廷内官名,属于楚王的侍御近臣之类的官职。《史记·张仪列传》记有中射对楚王之语,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注云:“盖谓侍御之官。”中谢之官因是楚王近臣,其言行对楚王影响颇大,甚至影响到楚国的朝政。《吕氏春秋·去宥》中就有中谢之官离间楚王与贤臣关系的记载:“荆威王学书于沈尹华,昭厘恶之。威王好制。有中谢为昭厘谓威王曰:‘国人皆曰:王乃沈尹华之弟子也。’王不说,因疏沈尹华。”在中谢之官离间之后,楚威王疏远了贤臣沈尹华。中谢之官“一言而令威王不闻先王之术,文学之士不得进,令昭厘得行其私”^{[23](P244)},因此而被斥为“细人”。《韩非子·说林上》还记有中谢之官(原文记作“中射之士”)抢夺方士献给楚王的不死之药的故事,中谢之官居然在抢夺楚王的不死之药后,又能通过一番辩词成功说服楚王免其死罪。这些都说明,中谢之官在楚国宫廷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不仅能左右楚王的意志,还敢在宫廷中肆意妄为。《楚居》所记“中谢起祸”一事,应该是发生在楚悼王在位时期发生的一起中谢之官祸患宫廷的事件,但因史载缺失,今天已无从考证该事件的原委经过。楚悼

王在“中谢起祸”事件发生后,与楚惠王在经历了“白公起祸”事件之后一样,前往肥遗(湫郢),在此避居过一段时间。

综上所述,清华简《楚居》所记“湫郢”即今湖北省钟祥市长寿镇长寿古城遗址。湫郢在春秋早期曾是楚文王北进中原的军事重镇;春秋中期成为楚国显贵宗族伍氏的封地,称为“湫邑”,也记作“椒邑”;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湫郢成为楚王避居的行都,楚惠王在此避居期间“吞蛭”患疾,因食“肥遗”(竹鸡)而治癒,遂将“湫郢”改名为“肥遗”。

参考文献:

[1]赵平安.试释《楚居》中的一组地名[J].中国史研究,2011(1).

[2]李学勤.论葛陵楚简的年代[J].文物,2004(7).

[3]李学勤.清华简《楚居》与楚徙寻郢[J].江汉考古,2011(2).

[4]牛鹏涛.清华简《楚居》武王、文王徙郢考[A].楚文化研究会.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十一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5]笄浩波.多维视野下的春秋早期楚国中心区域——清华简《楚居》之楚王居地考[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

[6]黄灵庚.《楚居》与《楚辞》互证五事[A].姚小鹏.清华简与先秦经学文献研究[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7]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A].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中华文史

论丛(第2辑)[C].北京:中华书局,1962.

[8]吴天任.杨惺吾先生年谱[M].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

[9]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10]张修桂.龚江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1]顾栋高.春秋大事表[M].北京:中华书局,1993.

[12]国家文物局.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13]湖北省钟祥县县志编纂委员会.钟祥县志[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

[14]何光岳.中华姓氏源流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15]黄锡全.楚武王“郢”都初探[A].李学勤.清华简研究(第1辑)[C].上海:中西书局,2012.

[16]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M].上海:中西书局,2010.

[17]郑樵.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9]张轶.中华古国古都[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20]王水香,陈庆元.古典文学与中医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7.

[21]王庆国.《本草纲目》金陵本新校注(下)[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

[22]吴禄.食品集[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

[23]吕不韦.吕氏春秋[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 刘春丽 E-mail:157476703@qq.com

A Study on “Jiaoying” in Chu Ju of Tsinghua Bamboo Slips

Xu Wenwu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New Media,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434020, Hubei)

Abstract: The words “jiao” and “di” are similar in shape, so “Jiao City” was miswritten as “Di City” in *Shuijingzhu · Mianshui*. The “Jiao City” recorded in *Shuijingzhu · Mianshui* is the same as “Jiaoying” in Chu Ju of the Tsinghua bamboo slips. According to the record of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surrounding water system of “Jiao City” in *Shuijingzhu · Mianshui*, “Jiao City” can be located at the Changshou Ancient City Ruins, Changshou Town, Zhongxiang City, Hubei Province, which is also the place where “Jiaoying” in *Chu Ju* is located.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Jiaoying” successively became a military stronghold of the Chu Kingdom, a feudal fief of the Chu nobility, and the place where the Chu king fled.

Keywords: Jiaoying; Jiao City; Changshou Ancient City Ruins